

采 风 集

◁ 乡 土 · 民 族 · 文 史 论 集 ▷

萧崇素 编 著



- 热爱乡土文化，研究乡土文化！
- 热爱民族文化，研究民族文化！
- 爱乡土，爱祖国，爱人民！

目 录

论《女神》…………… 1

——对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再认识（郭沫若诞生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赞“卡贝慈父”…………… 12

——谈《伊加利亚旅行记》感言

《阿坝地名》献辞

附：《阿坝杂韵》（六首）

凉山诗话

前言

一 悲壮的大迁移

二 “火把节”的起源

三 幽默的“阿衣巴底（单身汉）之歌”

四 千古绝唱的“阿惹妞体”（小表妹体）情歌

《格萨尔王传》本事撷英

前言

一 泪血的故事

二 别宫

三 路遇

四 泉边美女

《放下你的鞭子》是如何写成的（赵铭彝）

——抗日名剧《放下你的鞭子》定稿人赵铭彝教授专稿

“摩登社”杂忆

中国剧运的忠诚战士——赵铭彝

——一个戏剧活动家、戏剧理论家小传

通信一束

致赵铭彝、屈南松

致蔡富莲（彝）

致志玛拉西（藏）

《采风集》一辑、二辑存目

封面插画：彝族童话《大雁姑娘》插画，萧崇素文、张世明
画（载上海文艺出版社《彝族民间故事选》）

论《女神》

——对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再认识（郭沫若诞生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萧 康 素

在概括郭沫若一生新诗的成就上，长时间里不少同志常用“泛神论”、“个性解放”或“积极浪漫主义”等名词来概括它。一般认为他这给“五四”运动以来的诗坛以很大影响的诗集《女神》，正是他这类思想、认识、感情的具体展现。——这大概也是长时间中较有影响的一种看法。但当我们再度深入阅读《女神》和把新旧版的《女神》对照着详细探讨时，似乎发现这直到今天还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女神》，有着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也有为这些多少带有点学院味（Academic）的术语名词所掩盖的东西。这就值得我们来重新探索和重新认识了。

首先是“泛神论”一词，不管是别人或是郭沫若本人都偶然用这名词来概括他的作品。但一深入作品，就发现这名词是概括不了他那全部的奔放热情和深邃思想的，更不能概括《女神》整体的思想内容。这只不过是个“借词”，是一个象征性的借词。不独用于《女神》内容不确切，就是用于常为人认为是他“泛神论”的代表作的《三个泛神论者》也是不确切的。《三个泛神论者》的原诗是：

“一、我爱我国的庄子，／因为我爱他的 Pantheism
（“泛神论”），／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

二、我爱荷兰的 Spinoza（“斯宾洛莎”），／因为我爱

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磨镜片吃饭的人。

三、我爱印度的Kabir（“开比尔”），／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编鱼网吃饭的人。”

诗共九句，十分热情严肃，深刻动人。特别撷取了三个在思想、信仰上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崇高的实践精神的思想家和宗教家来作例。一眼看得出诗人的中心思想并不在那所谓Pantheism（“泛神论”），而在那思想家、宗教家们那种百折不回的反叛精神和殉道般的实践精神。他们纵然“打草鞋吃饭”、“磨镜片吃饭”、“编鱼网吃饭”也要为他们的信仰战斗到底，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景。而诗人要写的和至今还感动人的，恰恰正是这一点。

全诗中Pantheism一词的作用不大，只不过是一个含象征意味的借词。细细推敲，便见底蕴。

首先，庄子就根本不是一个泛神论者。庄子除继承、发展老子的“道法自然”，除其“顺应自然，返朴归真”的思想与原始泛神论的核心思想“自然即神”，有形似而神不似之点外，其它就完全不同了（郭先生博学，是知道这一点的）。庄子学说，自来主张“事物自生自化”；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主张“齐物我，……齐大小，齐贵贱”。实际上与“神”无涉而是一种取消“神”和否认“神”主宰一切的思想。既然“神”都否认了（“神”与“人”也是可以齐侔的），还是什么“泛神论”呢？因为十七、八世

纪的泛神论者虽反对教会，却是不反对上帝的①。至于印度的宗教家和诗人开布尔，《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有简明介绍。他是中世纪印度教的改革家，曾做过纺织工，晚年从事印度教的改革运动，开创比尔派，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其教义摄取伊斯兰教一神论因素，反对偶像崇拜、种姓分立和妇女歧视。号召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团结。写抒情诗，歌颂日常家庭生活及人间幸福。英人昂德希曾译有他的诗集《开比尔诗作百首》。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对印教派和古代奴隶制遗留下来的贱民制与妇女歧视的改革。由于他一生的反叛精神和苦行般的实践精神，在群众中赢得普遍的尊敬和影响。因此，在他身上，除是一个教派改造者的形象外，实找不出多少“泛神”的色采来。真正的泛神论者，只有那十七世纪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一人。他接受了文艺复兴期人文主义的影响，主张“神即自然界”；“神存在于一切自然界事物中”；“宇宙间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主宰”。——这种把神圣的上帝拉来和平常的“自然界”平等看待的哲学观点，在那还为教皇、教会统治的“黑暗时代”（哲学史上，称中世纪教皇统治时代为“黑暗时代”），当然是大逆不道了。这一思潮为后来欧洲哲学摆脱神学羁绊开了路；也为后来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自然观开了路。而诗人要用的，当然并不是他这带有革新意义的新神学——泛神论，而正是那反叛精神和“编鱼网”的实践精神！

——由以上理解来看，就知道所谓“泛神论”一词，只不过是一个适应“五四”那一狂飙时代要求的借词，是一种神论基督教的对立，完全是象征性的，而实质却是诗中那三人的崇高的反叛精神和那殉道般的实践精神。这样一来，这诗

就与这三个东西方哲人的精神面貌一致；与他诗集中的整体精神一致；也与诗人本人——郭沫若一生的成长、发展一致了。贯串于他全部诗集和他一生的学术思想以及那战斗的一生，正是他这青年时代就植了根的反叛思想和实践精神的贯彻。诗人感情奔放，热情如火、追求真理，有时几乎连自己也被否定，甚至要做那集香木自焚而死、而再生的凤凰。——这正是诗人对这种精神的歌颂和向往的文学反映。所谓“泛神论”，在这种精神与激情下已经微不足道而被冲淡了、而整个《女神》的动人处，恰恰正在于此。

关于“个性解放”，在《女神》全部诗作的总倾向上似乎仍然生不了根，甚至是游离和不确切的。“个性解放”一词，多少与资产阶级上升时代的“个性至上”、“个人至上”、“个性扩张”相表里，当时曾发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那时，若不认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解放”，是万难去彻底打倒和推翻那中世纪顽强而黑暗的封建和神权的双重统治的。不管那时诗人的部分思想还处于酝酿或萌芽状态，但他的诗已经为我们带来了不少新思想和新内容。他起点甚高，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个性解放”所能代表和包括：

第一，就《女神》的整体内容看，是全与所谓“个性解放”不相容的。首先是在诗集各处出现的那种群众观点和集体主义观点，以及那对工农群众的赞颂和对当时震撼了世界的“十月革命”及其先驱者、革命者的赞颂。因为传统中的所谓“个性解放”是永远与这些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新思潮、新观点是完全不合拍的，是完全与个体至上对立的集体主义思潮不合拍的，那么我们何必一定要用这古老而不恰当的名

简来概括我们这狂飙时代的狂飙诗人呢？

《女神》序诗的第一节中，诗人写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还写说：“但是，我愿意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我把她（指诗集）公开了。”第二节中，更热情地写道：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等的人，
你去，将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姐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第一节中：“无产阶级者”、“私有财产”、“共产主义者”这类在第一次大战后扰得全世界资产阶级大亨们日夜不安的洪水猛兽般的反叛性的名词，已经出现在他的诗中了。他写诗时，是1921年，这不够新鲜吗？第二节中，诗人把他的希望寄托在广大的群众身上，要诗集去和他振动数、燃烧点相同的人，要诗集去拨动那些可爱的兄弟姊妹胸中的心弦，点燃他们的智光。诗人懂得依靠群众，找寻群众的重要。诗人明白没有他心目中的“可爱的青年兄弟姊妹们”，他诗的创作将无目的和意义。这些，惊人的有着进步含义的群众观点与集体主义思想，又哪是多少有一点主观创造世界，或个人打天下色彩的“个性解放”所能说明和概括的呢？

同样，在诗剧《女神之再生》中，诗人所创造的创世女神，已不是古老神话中女媧娘娘一人而是女神一、女神二、女神三和众多的群神了。——这全与传统神话中的创世女神不同。不管这者诗人有意或无意的安排，这都反映诗人已经

认识到集体的力量，已经认识到那灿烂美丽的世界决不是一个女神双手所能创造出来的。这样鲜明的群众观点和集体主义思想出现于“五四”运动前夕，无论如何也是值得令人惊异的。若我们只用一个含混不清的“个性解放”去概括它，那就只会抹煞和冲淡这里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却光芒万丈的光辉思想了。

这观点还表现于这剧的结尾。当其工失败，怒触不周之山，世界一片黑暗时，舞台灯光亮了，那穿着学生服的青年舞台监督（多么具有未来希望的一代）向观众一鞠躬，高声地说：

“诸君，你们要望新生的太阳出现吗？还是请去自行创造去，我们待太阳出现时再会！”（闭幕）这反映诗人对人民力量的信任，对新生太阳的出现，要求广大人民去“自行创造来！”——这把创造的希望寄托于人民，要人民起来去共同创造和自行创造，那多少带有主观战斗色彩的“个性解放”，不是一下显得暗淡无光了吗？

在这剧中，农民和牧羊人登场，也是十分新鲜的。剧中农民和牧羊人作为穿插忽忽走过，农民怒气冲天咒骂好战者们糟踏了他的庄稼，他将难于生活；牧羊童用着尖锐的语言咒骂酋长和首领们，认自己不该喂饱这些“斗狗”，认“斗狗”们吃了他们的馒头，还吃掉他们的羊头。这里，诗人不只让劳动人民登上舞台，还用尖锐的带有政治性的语言批评好战者和统治者。这诗句和描写，又哪是一个简单的含义不清的“个性解放”所能说明和包括的呢？

关于积极浪漫主义一词，依词义讲，它代表一种由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叶的一种文学流派。这个伴随资产阶级上

升时代产生的文学流派，在反封建制和反古典主义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当资本主义制度逐渐确立和发展，逐步暴露出许多问题。十八世纪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家们所鼓吹的“理性王国”破灭了。他们所宣扬的“理性要求”和自由、平等、博爱（读者注意：这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由原始基督中借来的口号）很快蜕化变质。他们所追求的“理性王国”，到头来只不过是弱肉强食、唯利是图、殖民扩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号召的自由、平等，到头来只不过是新兴资产者独占的利益，一切工农群众和雇佣劳动者都毫无自由、平等可言。他们所追求的博爱，到头来却只是竞争中的尔虞我诈和相互歧视。——资本主义的现实，倒成了启蒙运动者们美好愿望的辛辣讽刺。正在这种理想破灭，社会动荡不安中，在文学中产生了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等流派。前者一味美化中世纪的封建宗法社会，鼓吹逃避现实（题材多写骑士美人），后来终于不为人民接受而衰微殒落；后者渴望斗争，面向未来，崇尚自由和解放，直持续至十九世纪中叶还有影响。若用这一名词来概括郭沫若当时的文艺思想和《女神》，似乎某些方面有接近处。但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内容不同，《女神》中的一切，已经不能由这似乎已成“化石”的名词所能概括的了。

《女神》与这一历史名词不同之点，首先在他们时代背景的不同。一个兴起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一个却起于民族觉醒，人民觉醒的“五·四”的狂飙时代。由于时代不同，它的内容与思想也完全不同了。《女神》中所表现的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对新兴的工农运动的赞颂，对人民斗争胜利的赞颂，都不是所谓“积极浪漫主义”所能概括的。它的内容，

比起李白式的（封建社会背景下的）或拜伦式的（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所谓“积极浪漫主义”的含义与内容，不是更广阔、深刻得多吗？

在二十年代初出版的《女神》中，对当时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就曾这样赞颂过：

“啊啊，雪的旷野呀！／啊啊，我所敬畏的俄罗斯呀！／晨安！我所敬畏的Pioneer（先驱者）呀！／”（《晨安》）

对革命理论的创造人和“十月革命”的领导人，诗人用反语写说：

“鼓励阶级斗争的谬论，饿不死的马克思呀！／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斯呀！／亘古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呀！／……／！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万岁！万岁！／”（《匪徒颂》）

诗人更重点地写到列宁，特别指出列宁的声音曾惊醒了他的梦：

“同胞！同胞！同胞！／列宁先生却只在一旁喊叫：‘为阶级消灭而战哟！／为民族解放而战哟！／为社会改革而战哟！／至高的理想只在劳农！／最终的胜利总在吾曹！’／同胞！同胞！同胞！……／他这霹雳的儿声，／把我从梦中惊醒了。”（《巨炮的教训》）

最新鲜的，是这诗竟出现于二十年代初头。更新鲜的，是这当年的青年诗人，对无产者的社会主义革命竟那样倾倒。这哪里是那伴随资产阶级革命兴起的“积极浪漫主义”所能概括呢？

从《女神》整体看，我们似乎应该用更科学、更全面的

观点去认识它、研究它，千万不能停于一般认识，或用一、二陈旧的术语去说明它、诠释它。若我们能从整体看问题，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以及作者本人一生战斗生活的成长、发展看问题，我们也许就会得到更科学、更全面和更有说服性的结论了。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几首最能代表他思想的成长、发展而又有助于我们理解《女神》和说明《女神》的诗。

如在《地球，我的母亲》一诗中，诗人首次提到工农大众，诗人赞颂“田地里的农民”，认他们是“人类的保姆”，赞颂炭坑里的工人，认他们是“人类的普罗米修士”（希腊神话中的为人类盗来天火而受罚的神）。《晨安》中，诗人用二十七个充满激情的“晨安”，向大自然、旭日、山川致敬。最后还对“十月革命”致敬。在歌颂人类创造的《天狗》中，诗人强烈地歌颂“人”，歌颂“人”的崇高和价值，歌颂“人”的创造力的伟大。他要吞月、吞日、吞宇宙；要做“全宇宙Enersy（“力”、“能”）的总量。去为人类大放光明”。诗中的“我”不是诗人一人，而是人类和人民的整体②。若这样解释，这号称难懂的诗也就容易懂了，而且知道诗人借用神话《天狗》一词的用意所在。《雪朝》一诗中，诗人已经用了“普罗列塔利亚诗人（“无产阶级诗人”）”一词。那仅在“十月革命”后的二、三年，这就令人感到份外新鲜了。在写渴求真理，渴求知识的《无烟忆》中，诗人就借与巴尔扎克齐名的斯汤达尔的名句“轮船要燃烧，／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来做开头，反映他对真理、知识，有着白热化的追求。——凡此种种，都是《女神》这集子最光辉的一面，也是它最激动人心和我们研究时不能忽略的一面。当我们深入《女神》，

认真吟味、赏析和钻研它时，就明白当时——那大动荡、大变革、大革命前夕的当时，他的诗能那样打动千百万人的心和无数青年男女的心的原因了。

在新版的《女神》（人民文学出版社）中，辛勤的编辑用简洁的《前言》为我们介绍说：“（郭沫若）是我国‘五四’以来杰出的诗人、作家和戏剧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对《女神》的诗作，《前言》介绍说：“这些诗篇热情洋溢地召唤中华民族的新生，气势磅礴地预示宇宙美好的未来，它不愧为我国‘五四’新诗歌运动中重要的成就，也是新诗中最早吹响的革命号角！”——这《前言》有助于我们对诗人和他的诗作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整个《女神》精神的理解。这深深打动当时人们的心：正是那贯串于他全部诗集中的那种坚毅不拔的反叛精神和殉道般的实践精神；是他那热爱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和集体主义精神；是他那热情如火的爱国、爱人民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那终身不懈的热爱真理、热爱知识的博大高远的探索精神——以上种种，正是《女神》成为“五四”以来“新诗歌运动”高峰的原因；也是它直到今天还有着强大生命力和影响的原因。这一切都不是那一、二名词所能注解、诠释和说明的。因为名词术语有时不易确切，经常容易使问题陷于含混、狭仄和朦胧，反而不易说明他诗作的本质和那动人的光辉；更难说明诗人思想的成长、发展和他后来在学术、文化和革命成就上的相互关联。因此，我们必须尝试来对这影响了一个时代思想和诗风的集子，作一番重新的理解和认识。

1992、7、1日，成都

注：①、庄子。——任继愈《中国哲学史》认：“晋郭象注本《庄子》，计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二。《内篇》对庄子思想有代表性。其它外、杂篇乃后来学派的汇编。”

王明《道家 and 道教思想研究》称：“《庄子》内七篇是没有神仙道教思想的。……内篇《大宗师》中的‘真人’，《逍遥游》中的‘神人’，皆无神仙宗教色彩。”

②、天狗。——黄淳浩《我国新诗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认这足以“把日月星辰和全宇宙来吞了的‘自我’，已经不是脱离时代，脱离现实斗争，只知图谋私利的‘小我’，而是扎根现实，扎根时代，与人民共呼吸、共战斗的叛逆者和革命者的‘大我’的形象了”。——这观点有助于我们对《天狗》一诗的理解。（文见，92年11月21日《文艺报》）

赞“卡贝慈父”

——读《伊加利亚旅行记》感言

萧 崇 素

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探索时期，谁能忘记写《乌托邦》（1516年）的莫尔（英）；写《太阳城》（1601年）的康帕内拉（意）；写《塞尔瓦兰人的历史》（1677年）的维拉斯（法）；以及后来写了《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2年）、《全世界和谐》（1803年）、《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1849年）等一大堆理论更臻成熟，以三大社会主义思想家闻名的圣·西门（法）、傅立叶（法）和欧文（英）呢？其中，更难忘记的，就是这一生领导工人运动，写出有名的《伊加利亚旅行记》（1841年）的卡贝（法）了。

对这些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和先行者，我们的经典作家们对他们都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和批判。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指出莫尔是“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称：“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至于卡贝，恩格斯称他是“法国广大无产者的公认的代表”（《马恩全集》4卷47页）。还说：

“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的……《圣经》是卡贝慈父著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的计划吸取了圣·西门和傅立叶计划中一切合理的东西。因此他们大大超过了先前的法国共产主义者。”

这个常常被马克思提到的卡贝是法国第戎城的一个手工业者的儿子。生于1788年，幼时在父亲的木工作坊里劳动，稍长，受过教育，作过教师，后入大学学医和法律，于1812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担任过律师职务，接着开始政治活动。）

19世纪20年代初，为反对复辟的波旁王朝，加入秘密组织的烧炭党。曾积极参加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后对资产阶级君主制的“七月王朝”不满，被国王调离巴黎，半流放到科西嘉岛任总检察长。1831年回到巴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这期间他提出广泛的民主纲领，抨击政府，指责国王路易·菲力浦背叛七月革命。数次遭到政府的指控，但均以无罪告终。1833年他手办《人民报》，深受群众欢迎，发行量达数万份。他通过报纸宣传激进的政治主张和揭露政府对工人运动镇压的罪恶，遭到了王朝的迫害。于1835年借故被判两年徒刑，逼他逃离法国，在英国度过长达五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在流亡期间，卡贝以在监狱中顽强从事著作的康帕内拉为榜样，不断思考、研究和写作。这时他曾自叙说：

“我因为献身人民事业而受迫害的时间太长，深怕从此不可能再直接参与这一事业，所以下决心要象康帕内拉那样，利用流放的时间进行思考和研究，努力使自己能再做一点有益于自己同胞的事情。”

这期间他狂热地阅读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的名著。由较早的莫尔、闵采尔、摩莱里、巴贝夫，读到近世纪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著作。莫尔的《乌托邦》一书，曾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他说：“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却深深地触动了我，以致每当我合起书来，总是不得不认真地思索一下共产制度的问题。”由于他对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兼收并蓄，尤其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学说的深入研究，他终于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思想集中反映了他写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中。在这本著作中，他并不是重复已往各家的论点，而

是有分析、有发展地吸收他们的合理因素，使之构成一个在当时显得相当突出的有机的整体，因而受到以后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评价和重视。

卡贝在他的哲学和社会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用相当具体的纲领描绘了一个完全确立共产主义制度的社会。他认为使用小说形式是比较易于把共产主义思想作通俗、普及的阐述，容易使各阶层的人都接受。在当时的法国，能直接由英文阅读欧文主义著作的人不多，圣·西门和傅立叶主义的内容和形式又不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卡贝这部引人入胜的通俗化了的小说式的游记作品，立刻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由于这部作品，他的共产主义学说被称为伊加利亚共产主义，他和他的拥护者被称为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而他本人，被他的追随者尊称为“慈父”。“卡贝慈父”这个名字就这样被传开，而为马克思的写作所采用。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他这幻想式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和他的《人民报》颇享盛名，曾掀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宣传运动。当时法国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约五十万人，妇女、少年还不在此内。1847年警察局对卡贝活动的反映说：

“七年以来，卡贝这人，把他生活的每一瞬间都用来实现他的理想，实现他的宣传和实践他的学说。他的信徒工人特别多，里昂、马赛等六大工业城市及瑞士接壤省分，都是重要共产主义者出现最多的地方。他在各省拥有通信员和宣传员三百五十名，他还与西班牙、瑞士、英国许多人有通信联系。”这报告大大震惊了当时法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对他发起了疯狂的仇恨和攻